



汉译人类学名著丛书

高丙中 主编

THE NUER

努尔人

——对一个尼罗特人群
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的描述
(修订译本)

[英] E. E. 埃文思-普里查德 著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014037675

K41
04-2

汉译人类学名著丛书

努尔人

——对一个尼罗特人群生活方式
和政治制度的描述

(修订译本)

[英] E. E. 埃文思-普里查德 著

褚建芳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4年·北京



北航

C1726081

K41
04-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努尔人:对一个尼罗特人群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的描述/(英)埃文思-普里查德(Evans-Pritchard, E. E.)著;褚建芳译. —修订译本.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4
(汉译人类学名著丛书)

ISBN 978-7-100-09566-2

I. ①努… II. ①埃…②褚… III. ①少数民族—部落—社会生活—研究—苏丹②少数民族—部落—政治制度—研究—苏丹 IV. ①K412.8②D741.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38882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汉译人类学名著丛书

努尔人

——对一个尼罗特人群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的描述

(修订译本)

[英] E. E. 埃文思-普里查德 著

褚建芳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9566-2

2014年3月第1版

开本 787×960 1/16

2014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21 1/2

定价: 48.00 元



北航

C1726081

014032872

新亞人學各書叢

E. E. Evans-Pritchard

THE NUER

A Description of the Modes of Livelihood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of a Nilotic People

First Edition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1940.

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本译本根据牛津大学出版社 1969 年本译出。

—— 一个民族的政治与生计模式 ——

非洲的努尔人

(本卷口译)

[英] E. E. 埃文斯-普里查德著

袁美新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4年·北京

具有专业素养的人类学家逐渐积累了记述异民族文化的技巧,把庞杂而散漫的民族志发展为以专门的方法论为依托的学术研究成果的载体,这就是以马林诺夫斯基为代表的“科学的民族志”。人类学把民族志发展到“科学”的水平,把这种文体与经过人类学专门训练的学人所从事的规范的田野作业捆绑在一起,成为其知识论和可靠资料的基础,因为一切都基于“我”在现场目睹(I witness),“我”对事实的叙述都基于对社会或文化的整体考虑。

民族志是社会文化人类学家所磨砺出来的学术利器,后来也被民族学界、社会学界、民俗学界广泛采用,并且与从业规模比较大的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结合,发展出宗教人类学、政治人类学、法律人类学、经济人类学、历史人类学、教育人类学……

人类学的民族志及其所依托的田野作业作为一种组合成为学术规范,后来为多个学科所沿用,民族志既是社会科学的经验研究的一种文体,也是一种方法,即一种所谓的定性研究或者“质的研究”。这些学科本来就擅长定性研究,它们引入民族志的定性研究,使它们能够以整体的(holistic)观念去看待对象,并把对象在经验材料的层次整体性地呈现在文章里。民族志是在人类学对于前工业社会(或曰非西方社会、原始社会、传统社会、简单社会)的调查研究中精致起来的,但是多学科的运用使民族志早就成为也能够有效地对西方社会、现代社会进行调查研究的的方法和文体。

作为现代社会科学的一个主要的奠基人,涂尔干强调对社会事实的把握是学术的基础。社会科学的使命首先是呈现社会事实,然后以此为据建立理解社会的角度,建立进入“社会”范畴的思想方式,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磨砺有效呈现社会事实并对其加以解释的方法。

民族志依据社会整体观所支持的知识论来观察并呈现社会事实,对整个社会科学、对现代国家和现代世界具有独特的知识贡献。中国古训所讲的“实事求是”通常是文人学士以个人经历叙事明理。“事”所从出的范围是很狭窄的。现代国家需要知道尽可能广泛的社会事实,并且是超越个人随意性的事实。民族志是顺应现代社会的这种知识需要而获得发展机会的。

通过专门训练的学者群体呈现社会各方的“事”，使之作为公共知识，作为公共舆论的根据，这为各种行动者提供了共同感知、共同想象的社会知识。现代社会的人际互动是在极大地超越个人直观经验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展开的，由专业群体在深入调查后提供广泛的社会事实就成为现代社会良性化运作的一个条件。现代世界不可能都由民族志提供社会事实，但是民族志提供的“事”具有怎样的数量、质量和代表性，对于一个社会具有怎样的“实事求是”的能力会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社会需要叙事，需要叙事建立起起码的对社会事实的共识。在现代国家的公共领域，有事实就出议题，有议题就能够产生共同思想。看到思想的表达，才见到人之成为人；在共同思想中才见到社会。新闻在呈现事实，但是新闻事实在厚度和纵深上远远不够，现代世界还需要社会科学对事实的呈现，尤其是民族志以厚重的方式对事实的呈现，因为民族志擅长在事实里呈现并理解整个社会与文化。这是那些经济比较发达、公共事务管理比较高的国家的社会科学界比较注重民族志知识生产的事实所给予我们的启示。

在中国现代学术的建构中，民族志的缺失造成了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的许多缺陷。学术群体没有一个基本队伍担当起民族志事业，不能提供所关注的社会的基本事实，那么，在每个人脑子里的“社会事实”太不一样并且相互不可知、不可衔接的状态下，学术群体不易形成共同话题，不易形成相互关联而又保持差别和张力的观点，不易磨炼整体的思想智慧和分析技术。没有民族志，没有民族志的思想方法在整个社会科学中的扩散，关于社会的学术就难以“说事儿”，难以把“事儿”说得有意思，难以把琐碎的现象勾连起来成为社会图像，难以在社会过程中理解人与文化。

因为民族志不发达，中国的社会科学在总体上不擅长以参与观察为依据的叙事表述。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中国社会在运作中所需要的对事实的叙述是由文学和艺术及其混合体的广场文艺来代劳的。收租院的故事，《创业史》、《艳阳天》，诉苦会、批斗会，都是提供社会叙事的形式。在这些历史时期，如果知识界能够同时也提供社会科学的民族志叙事，中国社会对自己面临的问题的判断和选择会很不一样。专家作为第三方叙事对于作

为大共同体的现代国家在内部维持明智的交往行为是不可缺少的。

民族志在呈现社会事实之外,还是一种发现或建构民族文化的文体。民族志学者以长期生活在一个社区的方式开展调查研究,他在社会中、在现实中、在百姓中、在常人生活中观察文化如何被表现出来。他通过对社会的把握而呈现一种文化,或者说他借助对于一种文化的认识而呈现一个社会。如果民族志写作持续地进行,一个民族、一个社会在文化上的丰富性就有较大的机会被呈现出来,一度被僵化、刻板化、污名化的文化就有较大的机会尽早获得准确、全面、公正的表述,生在其中的人民就有较大的机会由此发现自己的多样性,并容易使自己在生活中主动拥有较多的选择,从而使整个社会拥有各种更多的机会。

中国社会科学界无法回避民族志发育不良的问题。在中国有现代学科之前,西方已经占了现代学术的先机。中国社会科学界不重视民族志,西洋和东洋的学术界却出版了大量关于中国的民族志,描绘了他们眼中的中国社会的图像。这些图像是具有专业素养的学人所绘制的,我们不得不承认它们基于社会事实。然而,我们一方面难以认同它们是关于我们社会的完整图像,另一方面我们又没有生产出足够弥补或者替换它们的社会图像。要超越这个局面中我们杂糅着不服与无奈的心理,就必须发展起自己够水准的民族志,书写出自己所见证的社会图像供大家选择或偏爱、参考或参照。

这个译丛偏重选择作为人类学基石的经典民族志以及与民族志问题密切相连的一些人类学著作,是要以此为借鉴在中国社会科学界推动民族志研究,尽快让我们拥有足够多在学术上够水准、在观念上能表达中国学者的见识和主张的民族志。

我们对原著的选择主要基于民族志著作在写法上的原创性和学科史上的代表性,再就是考虑民族志文本的精致程度。概括地说,这个“汉译人类学名著丛书”的入选者或是民族志水准的标志性文本,或是反思民族志并促进民族志发展的人类学代表作。民族志最初的范本是由马林诺夫斯基、米德等人在实地调查大洋上的岛民之后创建的。我们选了米德的代表作。马

分与合的政治变奏曲(代译序)

赵旭东^①

《努尔人——对一个尼罗特人群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的描述》一书为英国人类学家埃文思-普里查德(1902—1973)的成名之作^②,此书最初是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牛津大学是他教书和从事研究的地方,而人类学的“牛津学派”也是因这位人类学家的名字而受人瞩目的。这本书自1940年出版,迄今已经过去七十多年了,但牛津大学出版社仍旧在不断地再版重印,足见其影响之大。这种影响当然不仅是在社会人类学这个学科之内,它还超出了这个学科而影响到了政治学乃至一般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

在英国传统的结构功能论人类学中,埃文思-普里查德总是以一位叛逆者的身份出现。他虽是马林诺夫斯基的学生,却经常讥讽其老师一派的理论,而私淑于法国年鉴派的社会学传统。1935年,他在牛津大学初识有着结构功能论人类学鼻祖之称的拉德克里夫-布朗(Alfred Radcliffe-Brown),从此便转向了法国学派的理论表述。1940年,他曾与另外一位牛津大学的人类学家福蒂斯(Meyer Fortes)共同编辑了一部政治人类学的开创性著作《非洲的政治体系》,此书便是由拉德克里夫-布朗专门写的导言,也为英国的政治人类学的风格定了调子。而在《努尔人》一书中,埃文思-普里查德对裂变制世系群的经典描述背后,实际影射出来的显然是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社会分工论》一书的影子,这本法国社会学派的经典之作1893年出了法文版,1933年有了英文版。

关于他所关切的苏丹南部的努尔人,埃文思-普里查德一生为此专门写过三本书,其中最为著名的当然就是《努尔人》这部书了,其余两部都在20

^① 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② E. E. Evans-Pritchard, 1940, *The Nuer: A Description of the Modes of Livelihood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of a Nilotic Peopl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世纪 50 年代出版,分别为《努尔人的亲属制度与婚姻》(1951)以及《努尔人的宗教》(1956)。

在《努尔人》这部人类学经典著作中,埃文思-普里查德所要集中讨论的是在一个没有中央权力的社会中,秩序如何产生和维持?这是那个时代的社会科学家所共同关心的一个核心问题,不单单只有人类学家才会关心。埃文思-普里查德造访的努尔人部落,当时属于英国的殖民地苏丹的一部分,当时,努尔人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刚刚结束。英国殖民者对于殖民地的惯常的统治方式是,维护当地的权威结构不加干预,实行间接统治。

正是这样的殖民政策,使研究当地人的政治制度显得特别必要和有现实的意义。对于苏丹境内的努尔人来说,情况更是如此。1885年,穆罕默德·艾哈迈德(Muhammad Ahmed, 1844—1885)领导的一次起义,攻占了苏丹首府喀土穆(Khartoum),英国著名的戈登将军(General Charles “Chinese” Gordon, 1833—1885)亦在此役中毙命,而艾哈迈德的部下坚守这座城池达 13 年之久。这是一块充满当地人和殖民者矛盾的土地,这个时候人类学家出现了,他们怀揣着殖民政府的资助,声称可以为政府顺利统治出谋划策。他们确实不同于其他的对于当地人狂乱掠夺的学问家,而是以谦卑之心,处处为当地人争得应有的权利,但是不可否认,他们从来没有怀疑过殖民统治者自身统治的合法性。

同样,在当时的英-埃苏丹政府的资金资助之下,埃文思-普里查德对尼罗河畔的这个被称之为“努尔人”的人群进行了一项长期并极为详尽的人类学研究。他那时的身份是莱沃霍姆研究所的一名研究人员,同时获得了这个研究所的奖助去从事他的实地研究。就像当年的马林诺夫斯基和拉德克里夫-布朗受到了塞利格曼(C. G. Seligman)夫妇各方面的资助一样,埃文思-普里查德似乎也不例外,在其序言中,他除了叙述自己与他们有着 15 年的交情之外,还没有忘记提到他们对于他写作这本书的实际帮助和鼓励。显然,塞利格曼夫妇在英国的人类学界属于当之无愧的先驱,即便是在非洲

的研究上也不例外,他们对靠近努尔人的施鲁克人(Shilluk)和丁卡人(Dinka)社会的研究成果,显然是这个领域最为基础的读物之一,埃文思-普里查德自然也是其读者之一。^①

埃文思-普里查德称“努尔人”为一个“勇敢而彬彬有礼的民族”^②,这并非是一位英国绅士的客套之语,而是那种丰厚的对于这个人民的描写,已经使得他油然而生出此敬语。而在这套民族志的描述背后,一个理论家的名字不能不提,那就是1935年秋天,曾经来过中国,并在燕京大学停留讲学两月之久的英国结构功能论人类学家拉德克里夫-布朗。如上所述,他与埃文思-普里查德也是在那一年认识的,在那之后,拉德克里夫-布朗只身来到中国,那时执掌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吴文藻教授对此有这样一段记述,颇值得引述:

一九三五年秋,英国著名社会人类学家拉德克里夫-布朗 Alfred Radcliffe-Brown 教授,(以下缩写,简称“布朗氏”,)应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之聘,来华讲学,鄙人与之终日相处,先后凡两阅月。谈论辩难之间,大恨相见之晚。^③

中国的社会学界在那样早的时间里,就把这位极为了不起的英国学者请到了中国,不论是像吴先生这样已经功成名就的学者,还是像林耀华、李有义等这样当时崭露头角的学生,大家都济济一堂,聆听这位来自英国的真正大师级的人类学家的教诲,这种情形要想重新复制,在今天已经是很难的事情了。

埃文思-普里查德从不否认,自己的理论思想的来源之一就是拉德克里

① E. E. Evans-Pritchard, 1940, *The Nuer*, p. vii.

② 同上书,第 viii 页。

③ 吴文藻,1936,“布朗教授的思想背景与其在学术上的贡献”,《社会学界》,第九卷,第1页。

夫-布朗;当然,还有另外一个人,那就是塞利格曼教授本人了。正像埃文思-普里查德的序言中专门提及的塞利格曼教授独具慧眼,注意到了他在书中所使用的“园艺”(horticulture)一词而非“农业”(agriculture)的妙处,这一点恰是人类学家的视角才能达致的一种自信,现实的场景无法让一位有着自己思考的人类学家,那么轻易地去接受书斋里的学者为田野的生活随意贴上去的那些带有想象性的各类标签。^①

《努尔人》这本书可以看成是社会人类学的田野民族志的写作方法外加上英国独特的结构功能论的分析视角的一部集大成之作,不仅文字洗练,且内容极为紧凑,颇似一位驾轻就熟的民族志学者在返回书房之后的沉思之作,此非一般的罗列田野资料的冗长民族志的描述所能真正比拟。我们从这本书的阅读中,不仅了解了那个被称为“努尔人”的族群,而且,还从这种描述中切身体会到了一种人类学的社会结构分析手法独特的魅力所在,它使得人类学的知识积累由此而真正成为了一种可能。

此书细分为六章,就民族志而言,属于专项的民族志,专门集中于社会组织与政治生活的考察,但其所有讨论又绝非就政治而政治,就社会组织而社会组织,背后不断在追问一个社会中其秩序的基础究竟在哪里?他在暗暗地与霍布斯这位英国现代社会的启示者进行对话,试图以此去说明一种自发形成的秩序其运行的妙不可言。那秩序是深藏于人们的生计(livelihood)之中的。努尔人对于牛的兴趣,显然是其部族生活中极为表面的特征,但恰恰是这表面的特征,作为引子,使得政治秩序的出现成为一种可能,人们的生活实际上是在依靠牛这种动物的生活节奏来进行安排,靠牛的交流来扩大相互的社会连带,也靠牛的赔偿来结束一场争斗,如此便构成了此书第一章的内容,即“对牛的兴趣”。要知道这牛是生态环境中的牛,是逐水草而居的牛,努尔人的生活也因而追随着牛的足迹、在干与湿这两季中间做着一种周期性的摆动。这可能才是人类学家眼中的生态,也是该书第二章所要叙述的核心内容所在。这个生态同时还是具体时间和空间下的生态,是人生活在其中切身感受到的一种时间和空间,它们依旧是由人来加以区

^① E. E. Evans-Pritchard, 1940, *The Nuer*, p. viii.

分的。这个讨论构成了该书第三章的内容。而后面接下来的三章构成本书中最为重要的讨论,那就是社会组织之中的政治生活。不同于我们很多人所熟悉的在国家这个“利维坦”巨灵约制之下的现代国家,那里的政治体系是一种不受高高在上的外在力量约束的一种体制,埃文思-普里查德将其称为裂变制。这种裂变制又恰恰是建立在一种“世系群体系”(lineage system)的分分合合的动态平衡的基础之上,这些便构成了努尔人社会与政治生活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让我们有机会反省我们的制度存在的非原初性和非唯一性。

这个位于非洲中东部的族群开始与西方人的接触并未早于 19 世纪中叶,那时,西方的殖民者不仅与当地人的接触“是无足轻重的”,而且留下的文字记述,也正像埃文思-普里查德所指出的那样,印象是“表面的,甚至有时是失真的”。^①而后来白人的有关这个地区的报道也都为埃文思-普里查德所专门提及。尽管之前已经有了一些从不同的角度提供的极为有价值的民族志材料,但显然到他去做实地田野研究的时候,这些资料也仅仅局限在一种民族学的材料意义上,对于努尔人的社会生活显然是缺少关注的。埃文思-普里查德恰恰是在这个方面开始了他的独立的人类学探索,并且把政治制度的考察放在了首位,而把努尔人的家庭生活放在了后续描述的位置上,并在后来的一本远不如《努尔人》出名的有关努尔人的婚姻与亲属制度的《努尔人的亲属制度与婚姻》一书中做了比较详细的阐述。而《努尔人》一书的核心,恰如作者自己所说,“描述的是一个尼罗特人群获得其生活的方式及其政治制度。”^②

三

这个自称为“纳兹”(Nath)的努尔人群,大约由 20 万的人口组成,并大多分布在尼罗河与索巴特河以及加扎勒河交汇处南侧的沼泽区域以及这些

① E. E. Evans-Pritchard, 1940, *The Nuer*, p. 1.

② 同上书,第 3 页。

流域所覆盖的开阔的草原地带,而另外一些便是分布在了索巴特河和加扎勒河的各个支流上。就像那个区域的其他非洲部族人的体貌特征一样,他们身体硕长、头颅较窄,与邻近的丁卡人极为近似,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文化上的接近,二者共同属于东非文化区,并一起构成了尼罗特人的一个分支,以施鲁克人为代表的说施鲁克语的一些支系,诸如洛人(Luo)、阿努阿克人(Anuak)、兰果人(Lango)等,构成了与努尔人相对的另外一支。^① 分化也便由此而展开,并贯穿全书的始终。

在东非的文化类型中,我们首先看到了向下延伸出去的一种分化与对立,即第一级的尼罗河-含米特人(Nilo-Hamites)与尼罗特人(Nilotes)之间的分化和对立,第二级是尼罗特人中的施鲁克-洛人群(Shilluk-Luo group)与努尔-丁卡人群(Nuer-Dinka group)之间的分化和对立,第三级的努尔-丁卡人群中的努尔人与丁卡人之间的分化和对立。这是在一种共同性之下的差异性分化,比如努尔人在很多地方都具有相似性,从体质、语言到风俗,让人无法怀疑他们有着一种共同的起源。至于他们的分化与对立,却又实实在在地存在,但人们并不知其从何起源。但对于这个尼罗河区域的人群来说,这种分化和对立又恰恰是其政治体系的重要基础。但正像埃文思-普里查德所专门强调的,努尔人的政治制度是与其生态环境纠缠在一起的,二者之间存在某种契合性。^②

而此种政治与生态的纠缠又是由人来连接起来的。人群的分化与整合,不仅是生态的结果,还是政治制度的根源。人群的范围有大有小,它可以被称为部落,部落又会分化成为裂变支(segments),还可以称此为氏族,氏族又有其世系群(lineages)以及年龄组(age-sets)。这样的分分合合的形态构成了埃文思-普里查德对努尔人政治生活的基本理解,他将其视为一种裂变制(a segmentary system)。而这种裂变制的核心就在于,对于每一个裂变支中的群体而言,它内部成员的身份和地位相对于外人而言具有一种不分化的同质性。^③ 这是埃文思-普里查德讨论努尔人的政治制度的核心,

① E. E. Evans-Pritchard, 1940, *The Nuer*, p. 3.

② 同上书,第4页。

③ 同上。

也是他最具代表性的发现之一。

分化是讨论政治制度的基础。努尔人的社会与我们的社会一样,人构成了政治生活的核心。但这种政治绝不是我们今天大多数人追求的所谓民主政治,而是一种地缘政治。人们依随自己所居住的地方的不同而天然地形成了一种我们与他们之间的分化。努尔人和丁卡人又不同于有着自身中心化政治权力的施鲁克人,如果后者被称为民族(nation)的话,那么努尔人和丁卡人的群体就要被称为部落了。他们的人群被区分成了诸多的部落,这些部落之间并没有共同的组织或者说中心化的行政(central administration),在政治上,这些部落只能属于一种松散的联邦的形式。^①而所谓的政治,恰恰又是指在这些地域上分散开来居住的大大小的部落之间的你来我往、分分合合以及明争暗斗。

而能够形成这样一种政治格局的基础恰恰在于,努尔人的社会不仅有一种地方性的社区共同体的认同,而且还有一种超越地方社区的联合起来一致对外的责任意识。由此便形成了一种以社区认同为基础的裂变分支的等级。最初一级的裂变支(primary sections)涵盖的是最大范围的部落群体,因此所占据的地域范围也是最为广阔的。接下来还会有次一级部落裂变分支(secondary sections),它相比初级的裂变支,不论在涵盖的人数上还是占据的地域范围上,都小了许多。接着还会有更小范围的,几乎是类似村落一级的裂变支,即第三级裂变支(tertiary sections),它由许多小村落组成,并成为努尔人的社会中最小的政治单元。在这个政治的单元里,核心变成村庄,它由家户群体所组成。^②

四

在努尔人的社会中,实际并没有一个由上而下进行统治的所谓政府的存在。在一种近乎是有秩序的无政府状态(an ordered anarchy)中,努尔人

① E. E. Evans-Pritchard, 1940, *The Nuer*, p. 5.

② 同上书,第5页。

过着他们每一天的生活。他们甚至连一个有权威的首长都不特别需要,那个在村落中最有声望的“豹皮酋长”(the leopard-skin chief)的名称可能只是一种不得已而加上去的翻译,在英文里实际找不到一个更为合适的词汇去翻译这个人物的实际名称,他往往是“一个没有政治权威的神圣人物”(a sacred person without political authority)。^① 在这一点上,西方的法律观念对他们而言也是没有什么意义可言的,在这个意义上,努尔人社会不仅缺少政府,同时也缺少法律,即缺少一个独立自主、一碗水端平的权威存在,因此,也就不能有所谓真正的法律裁决以及对这种裁决的具体实施。^②

虽然没有上述这些现代政治所要求的基本要素,但努尔人的社会并不缺乏政治。而且,努尔人社会的全部基础完全建立在一种以父系为核心的亲属关系之上,并依此来计算相互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的主体是一个排他性的只包括男性亲属在内的世系群体,显然,共同的祖先成为他们共同的认同来源。氏族属于一个最大的世系群,其构成的基础为一种基本的外婚制原则。从一个祖先下来的一些男性世系分支就构成了一个氏族的裂变分支。如此而可以有从最大世系群、较大世系群、较小世系群到最小世系群的不同等级的裂变分支的存在。而最小的世系群往往是人们平时经常会提起的一个世系群。在这个意义上,对于埃文思-普里查德而言,所谓世系群,其含义就是指“一组已故和在世的男性亲属,在他们之间,可以从谱系关系上追溯亲属关系”,而一个氏族的范围会更大一些,它指的是“诸多世系群构成的族外通婚系统”。^③

另外,世系群与政治群体之间亦有分别,前者乃是基于继嗣(descent)而出现的一个人群,它是亲属制度的世系群,是分散而扩展开去的,因此无法构成一个排他性的地方性社区。并且,亲属制度的价值观念,因为谱系性的继嗣,而可以在不同范围的层级发挥作用,这与有着一定地域范围限制并由特定层级的政治价值观发挥作用的政体之间形成一种鲜明的对照。依照这一点,我们可以约略体会到努尔人社会中分化体系的复杂,这里既有亲

① E. E. Evans-Pritchard, 1940, *The Nuer*. p. 5.

② 同上书,第6页。

③ 同上。